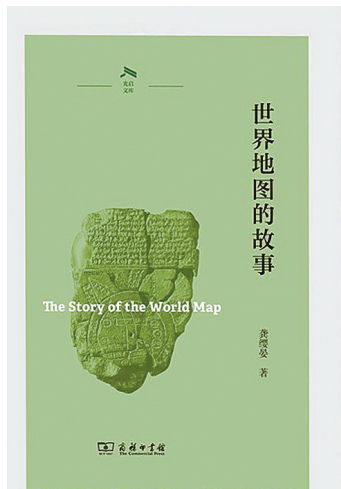


■ 宁波好书

在地图演变中看见世界的发展

——读龚缨晏《世界地图的故事》



李清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曾说,“地图是世界的镜子”,强调了地图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地图,向来是记录地理信息和探索未知世界的重要载体。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相较于对本土地图的关注,中国人对世界地图历史的探究较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波大学教授、兼任浙江大学历史系导师的龚缨晏所著的《世界地图的故事》,为

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地图发展历程的崭新窗口。

本书名为“故事”,实则是一部关于世界地图发展的文化史。书中详尽梳理了世界地图制作的历史脉络,并分析了其背后蕴藏的文化意义。作者凭借翔实的历史资料与丰富的实例,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世界地图制作技术从古至今的演进轨迹,为读者搭建起一个从全球视角理解地图学的坚实框架。通过阅读本书,不仅能知晓地图制作技术的变革,更能洞悉这些变革背后所反映的人类认知世界的发展进程。

全书主体分为六章。第一章回溯古代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涵盖了古巴比伦的世界地图、托勒密的地圆说,以及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深远影响和近代地图投影方法的演变等内容。第二章聚焦于形形色色的T-O地图,即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最为常见的一种世界地图范式。第三、四章探讨欧洲中世纪的特殊世界地图,分别为异形地图和挂图型世界地图。第五章阐述东方知识的扩大与地图学的进步。第六章则围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展开。作者在各章节中深入探究世界地图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意义,研究不

同时代地图面貌迥异的根源,以及古代和现代对世界地理观察存在差异的原因。特别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地图绘制技术随着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不断革新。这一过程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世界地图发展背后的科技进步,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更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与时俱进的视角。

作者在书中将西方与中国的地图发展历程进行了跨文化比较,使得本书的内涵超越了单纯的地图学范畴,成为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有力见证。例如,中国古代地图多服务于政治统治,用于明确疆土范围、彰显王朝权威,其中往往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文化和等级观念。而西方地图自古希腊时期起,就注重对世界的客观认知与探索,更多地体现了基督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强调实用性和平面布局,对地理信息的精确性要求相对较低。西方地图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入经纬度等概念,更追求地理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地图的演变史,无疑是人类发展史的生动注脚。书的“尾声”一章题为《从“天下图”到“世界地图”》,阐述了中国传统“天下图”观

念向近代“世界地图”观念的转变过程。古代中国人绘制的“天下图”,以中国为主体,四周国家为陪衬,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但随着西方传教士带来世界地图,以及近代西方列强的冲击,中国人开始逐步认识到世界的真实面貌,传统的“天下图”观念受到挑战,并逐渐被“世界地图”观念所取代。这一转变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也为今天带来深刻启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开放交流对于认知世界的重要性。

书中还穿插了众多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地图,为读者提供了直观的视觉体验。如托勒密时代的世界地图,清晰标注了当时已知的大陆、海洋,呈现当时西方对世界的认知框架;中国古代的《禹迹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方式,详细记录了山川、河流、城市等地理要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绘制地图的智慧;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以醒目的线条描绘出航海家们开辟的新航线,各国探险家的航行轨迹一目了然。部分地图上还绘制着神话生物、奇珍异兽等,为书籍增添了趣味性,让抽象的历史地理知识变得鲜活生动,引领读者轻松领略世界地图发展演变历程中的独特魅力。

我来只为读其书

潘玉毅

“北海西山皆可忘,我来只为读其书。”喜欢读书,是骨子里的一种本能,似乎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阶段都与书有关。

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读书是不得自由的。大抵在望子成龙的家长眼里,只要与学习无关,都算不得正经事。母亲便是如此,她固执地认为,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是闲书,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是明令禁止的。尽管母亲管得严,但若是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我宁可饿肚子,也会把饭钱省下来充作书费。记得有一回,我见到一套二手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集,甚是喜欢,可一摸口袋,只有孤零零的两张大团结和数枚钢镱。旧书本就是打了折的,再让摊主折价卖给我,这话怎么也说出口。纠结再三,我同摊主商量,能不能把书留起来,等我攒够了钱来买。惊喜的是,面对我的冒昧请求,他居然没有拒绝,还说可以等我。“我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来这里出摊,半年内都在的,随时欢迎你来。”我信以为真,完全没有想过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等我攒

够了钱再去时,连他的人影都未瞧见。我不死心,一连数周,逢周末下午就去摆摊处,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母亲不支持我看闲书,并不是她自己不爱看,事实上,最初启蒙我读书的正是母亲。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台老式收音机,收音机上放着一本《戏曲大全》,封面都被翻得脱落了,内页也变了颜色。家里只有母亲会唱越剧,能够演绎“韦编三绝”的多半是她。我曾偷翻过数页,书中的唱词很是吸引人,多年以后,我仍记得其中的一个选段《北地王·哭祖庙》。

母亲不止身教,还有言传。在我还未上学时,无论骑车带我去外婆家,还是载着我去自家的锯板厂上班,又或是去田间地头做农活,母亲一路上总会同我讲《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有趣的故事……那些故事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事实证明,没有一段故事是白听的。初一时,镇里举行阅读竞赛,考题里就有《郑人买履》的故事。虽然一道题并不能提高综合分数,却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故而那次考试名次很不错。后来,我萌生了寻找那些故事源头的想法,为此,我独

自走了很远的路,访过很多街角巷陌,在书店和报刊亭间流连。我甚至不声不响地拿过家里的钱,只为满足买书的渴望。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似的剧情周而复始地上演,从未间断过。

因为书,经历了许多至今回想起来颇觉好笑的事。我性格偏内向,但为了书,有时亦会主动与人搭讪,意图无他,就是为了蹭点书来看。有一次去喝上梁酒,同桌有个叔叔辈的远房亲戚,知我爱看书,谈及自己家里有本历年高考作文题的汇总,可以借给我。吃完酒席,我巴巴地跟他去家里把书借来了。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高考作文题委有些“深奥”,书中的许多文章我似懂非懂,看了大约一周,就把书还了。过了几天,觉得心有不甘,我又找个理由把书借来了。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反复多次。最后叔叔说:“你既然喜欢,这本书干脆送你吧。”我也不客套,拿了书开开心心地走了。

阅读的习惯一旦养成,轻易难以戒断。等上了初中,教自然科学的金老师、教社会的叶老师、实验室的管理人员,都被我发展成了书友。确切地说,他们更像是移

动的小型图书馆。有事没事从他们处借一本书来,我可以开心好久。甚至为了看书,我还隔三岔五进到校长阅览室。那个阅览室里放了好些报纸和杂志,平时门是开着的,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去,捧着新到的报刊圈图吞枣地翻阅,读到兴尽再大摇大摆地出来,一直不曾被人发现。

相比而言,高中三年无疑幸福许多。高中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阅览室印有专门的借书卡,几时借,几时还,书是何书,都会“记录在案”。而我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将那个小本本填得满满当当,特别有成就感。

我选择去西安读大学,“长安居大不易”,但足以包容一个异乡少年对于读书的渴望。过了月余,除了学校图书馆和超市二楼的书肆,汉唐书店、万邦书店和陕西省图书馆相继成了我开阔眼界、领略风景的后花园。我在这些地方买书借书看书,也在这些地方摘抄笔记。因为去得频繁,与书店的店员、图书馆影印室的管理员慢慢熟识了,他们打招呼的方式,从初时的“欢迎光临”变成“你来了”,后来又转为“你又来了”。每每想起,便觉得亲切。

很多往事如今已记不大分明,但跟书有关的一个个片段,像镌刻在花岗岩上一样,风吹不落,水冲不走。

守护文化根脉的壮丽史诗

——读祝勇历史小说《国宝》



林颐

总有一些事件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的天空。故宫文物南迁,永远辉映史册。它不仅是一场文物的大转移,更是中华民族在风雨飘摇中守护文化根脉的壮丽史诗。

1933年2月,华北局势岌岌可危,故宫珍宝危在旦夕。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文物南迁行动,悄然拉开了帷幕。从北平到南京、上海,又经长沙、汉口、宝鸡、

西安等地,最后落足四川、重庆,故宫人员保护着大批文物,辗转各地。直至战争结束,1946年至1947年,故宫南迁文物才踏上了归途。

这段历史,所有故宫人铭记在心。在《国宝》之前,祝勇已写过很多故宫历史随笔或纪实作品,其中包括《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研究侧重于冷静客观的梳理推敲,而文学作品可以呈现历史事件背后人们的行动轨迹、心路历程,让我们察觉那些被遗忘在“历史”之外的“人”的存在。

作为一个长久沉浸于国宝故事中的故宫人,祝勇不断地重返历史现场,迫切地想要写下前辈的故事,他们言笑晏晏,他们长歌当哭。他迫切地想要更多的人看见,构造历史事件的,除了骨架与主干,还有那些纤细的肌理、鲜活流动的血脉。于是,有了这部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

那文松,一个出身文物世家、从东北奔逃至北平、求职于故宫的职场新人,小说从他的微观视角切入。易东篱、马横岭、

唐知微、石不言、丁彤云、郭之南……那文松的上司与同事,好几位能在《故宫文物南迁》中找到原型,或者在其他记载中发现隐约的身影。他们从历史的缝隙中浮现出来,他们并肩携手,负重前行。有些人走了,用生命的代价铺平了道路;有些人活着,继续完成未竟之志。

在南迁筹备阶段,他们拟定可行方案,选择缓冲材料,保护不同形制的文物,每一个折角、每一处缠绕,都凝聚着他们对文物的珍视。南迁之路崎岖艰险,他们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行政的拖沓推诿、不轨小人的觊觎与构陷,他们衣食不保身心俱疲。而敌寇匪扰仿佛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文物的安全,在每一个惊心动魄的存亡时刻,他们都把文物的安危放在了自身的安全之上。

这是一群可歌可泣的故宫人。我们要记住的还有:梅从云、梅遇影、那永城、那文柏、丁铁竹、沈芷依、蓝星宇、郎山岳……或不惜性命拒绝投降,或投笔从戎抗击日寇,或在“国家”与“小我”之

间毅然抉择大义,他们的心灵何尝不经历着“南迁”?

梅遇影是那文松的妻子,她两次寻夫的经历,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第一次,她怀孕在身,听闻丈夫失踪,焦虑之下,带着女仆鸾凤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鸾凤被卖入广西大山,她身陷匪窟。第二次,她父母双亡,只身携带幼子,再次踏上寻夫之路,却不幸与幼子在途中离散。如果那文松没有跟随文物南迁,梅家和那家的悲剧是不是能减少一些呢?这是梅遇影的怨念,也是读者自然而然的联想。故宫人,费尽心思保护了文物,却无力保护自己的亲人。梅遇影的经历,是战争中千千万万无辜女性的缩影。

我们要记住的,还有所有帮助完成这场“接力”的人们,他们是“被放弃”的家属,他们是随行保护和运输文物的军方人员,他们是在抗战中牺牲的数万名火车司机和铁路维修人员,他们是所有尽心付出一己之力的人们。

这场故宫文物南迁行动,历时14年,行程2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涤荡烽火硝烟,跋涉万水千山,上百万件文物几无遗失或损坏,这是叹为观止的奇迹。千年丹青,万里河山。国之重宝,在物,也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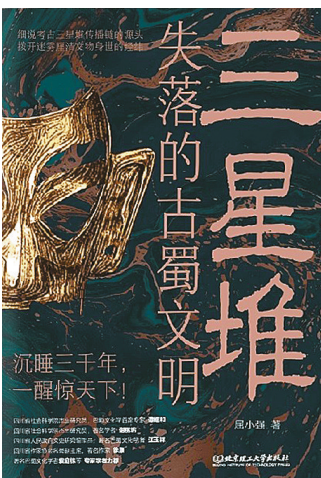


《人间百草》

作者 田炳信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12月

在《人间百草》中,作家田炳信以《本草纲目》所录草药为脉络,编织出一张融合博物、训诂等多学科知识的大网,展现古人朴素而深邃的价值观念。

从“小丑不丑”到“曼珠沙华”,从“紫苏荏苒”到“国老甘草”,从“驻颜白术”再到“有贝无患”,这些充满意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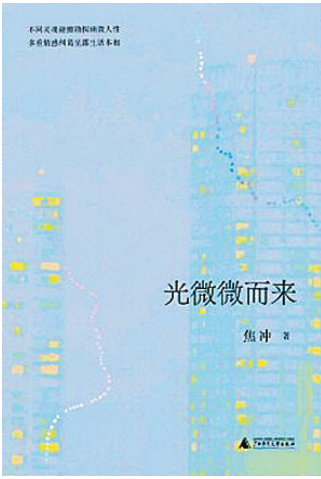


《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

作者 屈小强
出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11月

古蜀人来自何方?如何进入成都平原?何时建都立国?它与包括中原殷人在内的四邻关系如何……这一串历史文化之谜,在《三星堆:失落的古蜀文明》中可以找到答案。

本书巧妙地将考古发掘的历程与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探讨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及长江中下游文明的血缘关系,亦将古蜀文明置于全球史视野之下,由此观察古



《光微微而来》

作者 焦冲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5年3月

焦冲的长篇小说《光微微而来》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不同婚姻关系的交织叙事,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家庭困境。小说以朱晓辉与乔美琪的婚姻变化为主线,在城乡差异与代际冲突的双重维度中,描摹了社会变迁中个体的精神轨迹。

朱晓辉与乔美琪的婚姻悲剧本质上是两种文化基因的必然冲突。乔美琪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后代,其精神追求始终带有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

标题,打破了传统植物科普的单调范式。作者结合神农尝百草传说,从《尔雅》《诗经》《黄帝内经》等古籍中汲取养分,生动描绘了古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及他们对生命的体悟。

本书不仅介绍草药的生长环境、形态特征与药用价值,更剖析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哲理。半夏逆暑而生,别名众多,它的生长特性与古代物候学相呼应,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特殊地位。“假如自然界有公平一说,‘半夏’就是一个必选项,在阴阳裂隙之间,不偏不倚生根发芽。”

“人类了解自然,认知世界,认真记住一棵草、一朵花、一棵树,或取其叶,或取其茎,或取其根。”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者有着独到且深刻的洞察。古代“虞”官的信条与现代环保理念的呼应,则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态度的传承发展。三皇五帝时代,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古人所遵循的“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原则,恰如今天号召的节能减排、减少化学污染、参与植树、禁止非法捕捞等。

翻阅《人间百草》,我们可以走进微观的百草园,感受生命互动与自然温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生命与文化的关系。

(推荐书友:刘学正)

蜀文明对推进人类文明史的作用。

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在挖水沟时,偶然间挖到了一堆精美的玉石器,揭开了三星堆文明神秘的一角。此后,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耕耘,截至2022年5月,三星堆古文化遗址基本完成挖掘,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现了它独特的魅力。三星堆一号大型青铜神树分有三层枝杈,枝杈上有九鸟及龙,还有介绍说,枝杈应有兽、鸟、凤、蛇等挂饰。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还有很多,如青铜面具、铜扭头跪坐人像等,仿佛是古蜀文明派来的使者,跨越数千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

书中,还探讨了三星堆文明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从出土的与祭祀相关的文物规模与精美程度来看,古蜀社会极有可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等级制度。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物品,则表明古蜀文明与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存在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使得三星堆文明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同时也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播出去,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荐书友:汪恒)

本”特征——她对北京摩天大楼的迷恋,实质上是对符号价值的认同。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是朱晓辉的乡土根性,其返乡选择,印证了农家子弟在城市中的精神困境。小说通过二人对北京记忆的差异化处理——朱晓辉记住的是职场挫败与情感创伤,乔美琪怀念的是文化氛围与消费体验,精准呈现了城乡经验对认知结构的塑造。这种冲突在代际传递中进一步深化。朱晓辉不自觉地复制着父权秩序,与乔美琪秉持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在子女教育方式上形成激烈对抗。

作为叙事复调,朱小彤与张轩的婚姻演绎了底层家庭的生存悖论。张轩陷入传销的悲剧,既揭示了农村青年在城市丛林中的认知局限,也反衬出新时代赋予女性的突围可能。当朱小彤通过直播实现经济独立时,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遭遇解构。

作者没有将婚姻破裂的原因简单归结于性格差异,而是将其置于城乡二元结构、代际文化传递、性别因素等多重维度中考察。在语言风格上,作者采用近乎临床解剖的冷静笔调,通过克制的情感表达与精准的心理描写,实现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度勘探。

小说结尾那束“微微而来”的光,或许正暗示着:在价值观剧烈震荡的当下,真正的救赎不在于找到完美答案,而在于保持对自身局限的清醒认知。这种充满张力的叙事姿态,使作品既是对特定时代的忠实记录,也是对普遍人性的永恒追问。

(推荐书友:朱延嵩)